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

——杨度的“自度”与“度人”^[1]

董成龙

“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古代礼乐传统流散于士阶层之手，从“士”皆有“道艺”转化为有“道艺”者即可称“士”。^[2]这也就为士人在日后的精神裂变提供可能。士人一旦通过察举或科举成为文吏，便进入了政统的实际担当中（立功一达则兼济天下）；但更多的士人则无法成为文吏，便形成自立于野的“师道”（立德/立言一不得志独行其道），它可以细分为遁隐山林的逍遥人和“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3]的豪杰之士。豪杰之士作为文吏与逍遥人的中间状态，有时以政治儒生的面孔出现，“虽无文王而犹兴”；^[4]有时则以心性儒生的面孔出现，退入佛老。豪杰之士的精神状态与人生遭际往往与历史裂变时期相连。三顾茅庐时的诸葛亮、明夷待访时的黄宗羲皆可称作豪杰之士。

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这一历史裂变非往昔所能同日而语。1895—1905年间的10年，君主立宪的日本连续战胜中俄两个君主专制国（甲午战争、

[1] 本文初作于2010年，修改于2012年；此次刊出，除若干用语外，未再修改。几年间，业师邱立波先生和张源先生先后就本文提出了修改建议，谨此致谢。

[2] 详述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学术与文吏的分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礼记·檀弓》，杨度早年为《三国志赞》（王闿运撰）作注时曾就“世”与“道”的关系大发议论，兼及屈原。详述参见杨度：《郅（原）、管（宁）、田（畴）、张（谠）、胡（昭）、张（范）、凉（茂）列传第五》（1899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本文所引杨度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特别注明；凡杨度原文首次出现，均标注日期；所标页码均是该书页码。

[4] 《孟子·尽心篇上》。

甲辰战争)，这让国人喜忧参半：所忧者，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竟然在短短几十年内超越中华；所喜者，白种人并非天生优秀，黄种人亦可战胜白种人。自此以降，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在中国几为共识。

康长素、梁卓如等人虽有科举功名，却无法在文史系统中施展抱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时务报》），他们转而以豪杰之身奔走呼号，一时间所随者众。“学剑学书相杂半”（文士—武士）的杨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之人。^[1]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清代汉学的主导取向，由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嬗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士人由守穷（在野）向望达（在朝）的思想转变。”^[2]杨度便师从这一传统的代表王闿运（1892–1902），对乃师动心运思处心领神会，随后赴日留学、高中经济特科榜眼，更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五大臣代撰《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创刊《中国新报》，连载《金铁主义说》（1907年1–5月），开始了漫长的政治思想流变历程。而《中国新报》也逐渐与《民报》和《新民丛报》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君主立宪主张的重镇。

一、文明国家 VS 野蛮世界

“自甲午以至戊戌，变法之论虽甚盛，然尚未有昌言立宪者。政变以后，革新之机，遏绝于上而萌发于下，有志之士，翻译欧美及日本之政治书籍，研究其宪法者渐众。”^[3]总而言之，士人不再因华夷之辨而“为中国讳”，^[4]当时所有中国士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中国与世界是何种关系？“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5]“后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6]

1. 误以己国为世界

先秦中国尚有世界之中国这一观念的雏形。如邹衍之论：

[1]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十一月二十二日），第958页。

[2]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3] 伦父（杜亚泉）：《立宪运动之进行》，参见《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4] 《春秋》襄公二年。国人所熟知的“三讳”见于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49页。

[6]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1〕

秦朝以降，封建破而郡县立，由“宗法社会”而进入“国家社会”，闭锁于长城之内，则“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一词，而中国之人民，亦仅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2〕

及至晚清遭遇西方列强，方始真正严肃处理所谓世界问题，杨度亦深感邹衍之论不无道理：“三代以前幅员甚广，邹衍之言九州，亦有所本，非尽由臆测也。”〔3〕重新回到开阔的世界意识中：“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4〕非但如此，自鸦片战争直至甲午庚子，国人自尊尽落无疑，面对世界羞愧难当。“中国为世界各国之中国，而非复中国人之中国，此其与昔者所谓中国即世界之观念，其相击刺、相反背为何如乎！”〔5〕杨度清楚地意识到，要在“鉴于以往，有资于治”的“通古今之变”传统中走出来，另觅一条平行对比的世界观感，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理解“新中国”（此新中国非当下常识所谓新中国）的可能与必要。《金铁主义说》开篇即“今中国所处之世界”，结尾为“世界将来之中国”，足见杨度心志。

2. 偏以己国为世界

中外虽然都以己国为世界，但两种世界观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人本不知有大世界，而误认为己国为世界；各国人乃知有大世界，而偏以己国为世界”。〔6〕因为“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7〕所以，文明国家彼此互动却最终合成野蛮世界。换言之，西方诸国除在本国治理上以国家主义消弭宗法主义、封建主义，还在国际场域中以国家主义消解国际和解的可能性，对外只知有国家利益，而不知有世界大同。日本初试社会转型之时，福泽谕吉精妙地意识到人的私德与公德之别，而现代社会的要义在于确立每个个体的公德。吊诡的是，西方文明国家内部，每个人都逐渐成为有公德的公民，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

〔1〕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 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1月20日—5月20日），第213页。

〔3〕 杨度：《杨度日记·庚子日记》（八月十九日），第1038页。

〔4〕 同〔2〕。

〔5〕 同〔2〕，第216页。

〔6〕 同〔2〕，第217页。

〔7〕 同〔6〕。

个体的国家却不能成为有公德的国家，而只是有私德的国家。换言之，国家中有公德的公民合成世界中有私德的国家。或许正因如此，杨度以为“此数文明国，不足以当世界之目”，^[1]观点一目了然，西方人虽文明，但不足以成为世界文明的担纲者。

既然身处野蛮世界就应了解野蛮世界的生存法则——优胜劣汰，“特欲以中国与各文明国并立于此野蛮世界中，而无不适于生存，有优胜而无劣败之国也”。^[2]

3. 经济的军国主义

正当中国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而展开由清廷主导的洋务运动时，普鲁士凭借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大业。杨度心羡于此，为中国量身定制金铁主义。

这个野蛮世界必然要干涉中国。干预中国有两种方式：“外国对于中国之政业，亦非一致也，有主土地均分者焉，有主财产均分者焉，二者之主义不同，其不以中国土地上之财产为中国人民之财产则一。”^[3]两种干预方式的典型代表是俄国和美国，至今如此。

“前乎此有为土地而战者，自今以后，则非为经济势力之扩张，必不与人战。故其战也，可谓之曰经济战争。”^[4]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扩张者主张保全主义，而杨度认为这比明目张胆的“瓜分主义”更加阴险，无非是一种“灭国之新法”。^[5]

郑观应作为“七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卓著的改革派的思想代表”，^[6]杨度必定读过：

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客，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7]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218页。

[2] 同[1]，第219页。

[3] 同[1]，第214页。

[4] 同[1]，第221页。

[5] 杨度演说辞，参见袁鹤皋《朱师晦的〈癸卯日记〉》，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卷五）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6]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

郑氏对本末的看法已经超越了“农本商末”和“战本商末”的固有思想。足见郑观应已道破西方奥秘，西人帝国非军事帝国，实为商业帝国，看似无形的资本构成其无所不在的帝国统治。

杨度也意识到了经济的重要，“今中国之所以劣败于各强国之下者非有他焉，即我国制经济力不如彼，军事力不如彼，而仆倒于经济战争之下耳”。^[1]与郑观应一样，他也模糊地意识到中国人作为整体能否承接住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的理性生产方式的普世化问题，西方的经济拓展“由商而工，由工而矿，由矿而农，步步为营，得寸则寸，而于铁道、航路等有关于经济之交通事业，亦争之无所不至”；^[2]若中国不能承接西方的经济扩张，最后的下场是，即便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会使国族整体沦陷：“外国客人皆将为资本家，中国土人皆将为劳动者。”^[3]以此逻辑，经济战争关系到国族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

同时，杨度也意识到了兵战的重要，构思了经济的军国主义说。那么，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如何？“以分量言，强国不能轻于富民，军事立国不能轻于工商立国……以次第言，则非富民何由强国，非工商立国何取军事立国。”^[4]经济发展，可对内巩固民权；军事加强，可对外拓展国权。

杨度选择金铁作为象征物，实有洞见。一方面，“金”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因素，日后世界经济确立金本位制即是例证；另一方面，“铁”是政治—军事生活中的基本资料，日后欧洲推行一体化首先开展钢铁联营亦是例证。

表 1：经济的军国主义核心内容

维 度	原 则	手 段	目 的
对内（民众）	工商立国	扩张民权	自由且富之人民
对外（国家）	军事立国	巩固国权	负责且强之国家

“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 221 页。

[2] 同 [1]，第 227 页。

[3] 同 [2]。

[4] 同 [1]，第 234 页。

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1]总而言之，中国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2]经济—军事实力即国家之体魄，对内超越特殊集团利益、对外以国家利益至上即国家之精神；以前者言即“金铁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以后者言即“世界的国家主义”。

二、种族革命 VS 政治革命

西人入华使杨度充分意识到中国中世纪王朝的政治历史悲剧：中国始终未能摆脱把特殊集团等同于整个国家（the whole nation）的命运，以往中国是家族国家（家国），满洲中国是种族国家（族国，钱穆卓有见识地称之为“部族政权”），因此虽然中国政治数千年，亦是最早的官僚制国家，但它始终在这一逻辑上停滞不前，无所谓政治成长，它的政治后果从来都是特殊集团借助国家之名将集团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而此次西人入华带来的冲击，是以往朝代更迭所不可比拟的新天新地。

在杨度看来，因为清廷政权是种族国家，不足以成为开明专制的担纲者，所以“与其求有开明之政府，而人民赖以开明，何如求有开明之人民，而政府不得不开明乎！然则中国现今之专制政府，其不足以当开明之目，亦既明矣”。^[3]杨度对当时中国做出的政治诊断是：人民缺乏责任心，因而导致放任政府产生。乃师王闿运讲“古无必亡之国，国无不治之理”，杨度的治国良方就是：唯有统一人民，使之有责任心，才能发挥人民的能力，从而组建政党，促成国会开设，最终得建责任内阁、建成“经济的军事国”。

1. 何谓“人民”？

既然“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4]而想要“巩固国权，亦为吾国今日重要之一国是，而非民权扩张之结果，则无由巩固国权”。^[5]但问题随之而来，何谓“人民”？

明亡清兴，异族统治问题成为萦绕在中国士人心头上的幽灵，甚至也牵连东亚政治生态——朝鲜王朝亦有反清复明，但清朝“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遂有二代遗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234页。

[2] 详述参见杨度：《支那教育问题》（1902年10月21日—11月5日），第40—70页。

[3] 同[1]，第240页。

[4] 同[1]，第231页。

[5] 同[4]。

民出仕清朝，逐渐在汉地消化了满洲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人接二连三的攻击，汉地满洲统治者的合法性被再次提出。

不过，在杨度看来，满洲政权统治不佳，对内偷钱，对外送礼，但并不一定要诉诸种族革命加以解决。首先，满洲统治对汉人而言并非很多激进分子所谓的“亡国”。国家有三要素：“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亡，否则其国无自而亡……君主非国家，种族亦非国家。”^[1]因此蒙元、满清征服汉族，只要还依旧在这块土地上行使统治权，人民还是这块土地上的那些人民，便没有亡国；虽然出现异族统治这种看似断裂的政治时期，但国家始终得以存在并延续。第二，晚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非种族革命所能解决，而必须诉诸政治革命。杨度意义上的政治革命，首在国民统一（意即日后孙中山所说“五族共和”）。如若以排满的大汉族主义组织动员革命，则定会势如破竹，但这本身无法摆脱把特殊集团等同于整个国家的中世纪逻辑。无论汉族最终能否成为统治民族，种族革命式建国的政治实质与满州压迫汉人无异。在反对种族革命的同时，杨度便道明了他的“人民”概念。

既然五族之人都是人民，便必须正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即种族之间的关系。杨度的国民统一之策便是“满汉平等，蒙回同化”。^[2]

首先是满汉关系，“满汉问题集中之处，不在皇室而在八旗兵制”。^[3]八旗制度是满洲兵制，亦是满洲统治的重要方式：

合中央与地方所支出者计之，每岁总数约一千万。自国初至今，二百六十余年，其所用于八旗之总数，已在二十万万以外、三十万万以内，较之庚子赔款多至五六倍，亦诚可骇之巨数矣。此款之所自出，乃取之八旗以外之汉人，使汉人出资以养旗兵，而因以防汉。^[4]

满洲统治者以政治压迫消弭汉族在经济方面相对于满洲的比较优势，由此形成社会上政治一经济的割裂和对立。因此，解决满汉问题，“在汉人则曰政权平等，在满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264页。杨度已经较为开明地审视异族统治，但问题是，既然蒙满统治汉族，仍可称中国，为何欧美日等异族统治汉族便是亡国？

[2]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03页。

[3] 杨度：《国会与旗人》（1907年10月15日—1908年1月12日），第436页。《金铁主义说》发布近半年后，杨度在《中国新报》连载《国会与旗人》，又名《撤旗私案》。

[4] 杨度：《国会与旗人》，第434页。

人则曰生计自由”。^[1]其次是蒙回同化。“八旗制度者，种族阶级之制度也。一兵制之中，而欲以种族之区别，权利之高下，义务之多少，一切寓诸其中，则安得而不紊乱至此！”^[2]换言之，在满洲开发自我生计能力、汉族发挥政治能力的同时，实现蒙回向满汉的同质化转变。

综上，杨度的种族政策实际是混合民族界限，从而消解民族界限，形成每个个人互相面对而组成的国家，而非由不平等的种族所构成的国家。在此意义上，他之所说当是“五族均质”，而非“五族共和”（五族共和是“和而不同”）。在五族均质的过程之中，必然要有担纲者引领道路。

美哉中国！惟汉人能创之，亦惟汉人能亡之。惟其能创之也，故不可不负责任；惟其能亡之也，故愈不可不负责任。所谓责任者，政治上之责任也。^[3]

杨度的观点很明确，即以汉族为中国政治担纲者展开政治革命（“所谓责任者，政治上之责任也，故谓之政治革命”^[4]）。汉人若能担当政治责任，促成五族均质进而实现国民统一，则民众便具有政治责任，如此才可发挥国民之能力，才足以使徒有内阁之名的中国官制转化为新的责任内阁。可以想见，若以此观之，日后的皇族内阁岂能为杨度所允？

杨度诉诸责任心，实乃希望人们过上公共生活，每个人成为公人（公德），而非单纯的私人（私德）或熟人。唯其如此，方可超越二千年中国的乡愿与秦政（“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

那么，汉族担纲责任何以使人民具有责任心？——“人民有参政权则有责任心也。”^[5]拥有参政的权利（如满汉政治平等），方可构成人民与政治的实际关联，从而才能激起责任心；有责任心方可有权力——于内有民权，于外有国权。

2. 组政党，开国会

“开国会解决一切政治问题。”^[6]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04页。

[2] 杨度：《国会与旗人》，第429页。

[3] 同[1]。

[4] 同[1]，第305页。

[5] 同[1]，第340页。

[6] 同[2]，第458页。

“吾民以何种方法而得国会之开，此真今日中国政界之第一重要问题也。”^[1] 举世观之，国会建立过程中，人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两种：“出于人民自动、政府被动之力为多，出于政府自动、人民被动之力为少。”^[2]

表 2：三种君主立宪政体

国家	国会与宪法的先后关系	国会与君主的权力关系	宪法程度
英国	国会先于宪法	国会权力多于君主	高
德意志	同时发生	权力相等	中平
日本	国会后于宪法	国会权力少于君主	低

这一时期的杨度认为英国的君宪程度高。就中国而言，

欲政府能自动而开国会与否，不仅非吾民所宜研究之问题，亦且非吾民所宜怀挟之心理。一有此心理，则依赖政府之心生，而已身所以为其国民之责任心必减少矣。夫使国民之责任心为其依赖心所夺，则中国之国会将永无能开设之一日。^[3]

因此，要师法英国，人民自下而上促成国会的开设。“吾民今日之所当注意者，不仅对于宪法之善恶，可以姑置不问，亦且对于宪法之有无，并为姑置不问，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4]“既有国会，则政府必负责任，其有责任心不待论矣。”^[5]而国会既成，则宪法、君宪自然而成。

人民如何促成国会之建立？就现代而言，有两种基本方式，以个人方式或以团体方式。杨度“主张立政党以谋开国会”，^[6]如此主张的最大理由在于，政党之主张可以绵延不绝，而个人之目的则随人形灭而亡。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 341 页。

[2] 同 [1]，第 341—342 页。

[3] 同 [1]，第 342 页。

[4] 同 [1]，第 391 页。

[5] 同 [1]。

[6] 同 [1]，第 347 页。

国会之所以发达，由于政党之发达；政党之所以发达，由于国民之发达……国民发达之后，则公共之心必盛，一国之政党，各去其小异而取乎大同，各戢其私心而谋乎公益，彼倾此轧之心渐泯，人负我胜之见不深，其结果也，群而不党之黄金世界虽未易一蹴而期，然不得已亦必仅有二大党以行于国中。^[1]

可见，杨度认为立政党是人们培育公德、确立公心、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但他对政党所可能产生的代种族国家而起的政党国家（党国）有足够警惕。所以他说，政党一定要在开国会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若其不然，一国之人散漫不聚，即有一团体、一党派之结合，然其人乃自由团合之身，而非国民全体选举之代表人也。”^[2]质言之，若政党是在政治门阀决斗的意义上成立，则仍是中世纪的统治逻辑，即以特殊集团等同于整个国家（从家族国家、种族国家到政党国家的变种）。

与杨度不同，同样主张组党促改革的民主立宪党人，对内主要依靠武力，对外主要依靠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以杨度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党人，对内既可依靠舆论（笔杆子），亦可依靠武力（枪杆子），对外则无所依赖。可见，无论对内抑或对外，君主立宪党人所受掣肘要小得多。

3. 政治行动与思想转变

在发表《金铁主义说》等作品的同时，杨度践行本人主张的经济实力之培养，以为“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藪，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3]他本人也与朋友一起开公司。这与张謇实业计划的“棉铁主义”交相呼应。

另一方面，杨度又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这正是杨度公开表示不依附康梁，独立结党的第一步。半年后，更名为宪政讲习会，宣布“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提出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后又更名为宪政公会，杨度为常务委员长。此时的杨度，已经通过张之洞、袁世凯举荐出任宪政调查官提调。是年年底，拟定《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杨度乃近代中国请愿运动的开创人，他与张謇等人分别组织的国会请愿活动，形成一股强劲思潮。遥想当年，一副知行合一的政治儒生面孔跃然纸上。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83—384页。

[2] 同[1]，第391页。

[3] 杨度：《国会与旗人》，第431页。

清政府最终决定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杨度为其撰写《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但清政府的立宪恰恰命中了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的两个坚决反对之处：朝廷单方面颁布宪法和预备立宪；而在实际运行中，杨度帮忙清廷，也表明他的思想转变。

首先，《钦定宪法大纲》不是人民促成国会进而建立宪法的英国式君宪，而是朝廷单方面上谕颁布的宪法。一年前，杨度尚以为：

假使一旦而成立宪，由朝廷颁布宪法，国民而承认之乎？无一机关可以代表国民而曰吾民承认也。国民而不承认之乎？亦无一机关可以代表国民而曰吾民不承认也……仅由朝廷一面定之，而国民意思不少参入焉，则宪法程度虽欲不低而何能不低？^{〔1〕}

其次，一年前的杨度也讽刺所谓预备立宪：

立宪则立宪耳，无何等之预备；开国会则开国会，亦无何等之预备。日本政府当时不惟不即开国会，乃反远约十年之期，必其时国民主张国会之力不强，政府以为虽不即开国会，无不可者故也。及其十年期至，又复先布宪法，而后开国会，亦必其时国民坐待国会之至，如今日中国国民之坐待立宪者。^{〔2〕}

杨度为清廷帮忙的时候，自然也就打破了本人所坚持的师法英国君宪之论，而走向师法德日的君宪模式——“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和平改革者，宪政必有年限。”^{〔3〕}政治立场发生微妙转化，也表明他的身份由立宪派的在野豪杰转为清政府筹办宪政的在朝文吏，或许是盛邀之下难却借尸还魂的文人梦想亦未可知。

杨度本人是充满矛盾纠结的：

既反对不足有为的清政府，又反对以“驱除鞑虏”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既看到民主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又害怕革命的破坏性太大，既希望用改良手段来改造中国，又不满保皇派死保满清皇统；既察觉到满清统治摇摇欲坠，又不愿放

〔1〕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91页。

〔2〕 同〔1〕，第392-393页。

〔3〕 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1908年9月），第511页。

弃在清政府内部施展抱负的希望。^[1]

杨度参与其中，还对清政府抱有希望，“昨霄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2]却不料投诚清廷 3 年，革命打破了他的最初设想。

三、中华民国 VS 洪宪帝制

1. 接受民国 VS 共和弊病

清廷准以预备立宪，一面开办咨议局与资政院，一面又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3]一面开放言论与思想，让人民看到希望，一面又控制政治意见的表达，让人民浇灭希望。海水与火焰的交织反而促成革命。^[4]即便在武昌首义后，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削减《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君上大权”部分，也难免革命党破竹之势。

清帝逊位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君主立宪派与共和立宪派的论争。在种族革命上，宣布“五族共和”。在政治革命上，以《清帝逊位诏书》的和平方式解决了国体转换。新建立的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已经不是原教旨意义的共和立宪主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杂糅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

杨度此前所考虑的主要是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别，在这点上他与共和学说的差异没有传说的那么大。他们的主要差别在于斗争方法，当革命已经取得阶段胜利而迎来建设阶段时，方法之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杨度自然会去“识时务”地参与中华民国。但杨度很快意识到中华民国并非他的理想寄托：“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5] 1913 年，他把两个儿子送去德国读书，亦可窥见他心中的理想政制。与德国相比，中华民国的问題一箩筐。

（1）中华民国并未真正解决清帝问题。清帝逊位不假，但尊号仍保留，享有异于民国国民的特权，与中华民国平等的立国原则相悖。在这个意义上，号称共和宪政的

[1]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0 页。

[2] 杨度：《和夏寿田陶然亭题词》（1910 年秋），第 525 页。

[3] 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 年 4 月），第 576 页。

[4] 关于类似统治促成革命的分析，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天才洞见。

[5] 同 [3]，第 563 页。

中华民国保留了虚君的影子。^[1]

(2) 革命党人破坏本党所建立的法统。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国民党控制的议院即调整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这种因人更制的行为,违背了革命党本身对宪法的尊崇。在后世革命史观书写下的历史中,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这种背反行为反受夸赞,而指责革命党人因人更制的杨度却反遭痛斥不能一以贯之。历史之反讽如是。

(3) 中华民国“虽有《约法》及各议会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2]换言之,民国所谓“民主立宪”实际上成了“民主专制”。^[3]

(4) 在军事上,强国无望:“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4]而军事内乱使实业不能发展,即所谓富国无望:“以二次革命为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5]

2. 君宪:旧说新法

在杨度看来,民主立宪的破相便要求君主立宪的旧事重提,另一方面,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国内威望顿失,也需要舆论造势。因此,杨度便有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君主立宪国》及《筹安会宣言》。不过此次君宪旧事重提,几于新说。

(1) 不在政体而在国体。在晚清君主制下,杨度倾心君主立宪,尚为政体研究;而在中华民国的民主立宪制下,依然研究君主立宪,却已是国体研究。同为君主立宪主张,差别却极大。杨度已经从“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中走出来。既然共和派的主要思想是师法美国共和,杨度便搬出美国学者的论述,认定共和在中国没有根基:“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6]杨度旋即成立研究国体之团体“筹安会”。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亦因此而发:

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为巧取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当恪守之好例,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

[1] 相关论述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2] 杨度:《君宪救国论》,第565页。

[3] 杨度:《筹安会第二次宣言》(1915年9月29日),第594页。

[4] 同[2],第564页。

[5] 同[4]。

[6] 杨度:《筹安会通电》(1915年8月20日),第588页。

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1]

(2) 宪政差别不在国会,而在人民程度。杨度先前驳斥了人民程度不同而宪政程度高低不同的观点,认定国会与宪政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国家宪政程度高低(见表2);而此时,却走到了他曾经批驳的旧路,认定人民程度之高下决定宪政程度之高低。杨度先前批驳反对者以人民程度不足为借口阻挠开国会,而此时他却以人民程度不足主张君权。

若人民智识不及法、美,而亦握此无上之权,民必嚣乱纠纷,等于民国二年之国会,不能图治,反以滋乱。若矫而正之,又必悬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我国现行之总统制。^[2]

(3) 不求诸人,反求诸君(废总统立君主)。杨度先前以为,如若君主负责(“成王有过则挾成王”),则一旦君主失责便会造成“起革命军以改造皇室”,^[3]易生动乱,于是主张虚君责任内阁(“成王有过则挾伯禽”)。而今,鉴于人民程度不足,民主立宪已成民主专制,“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4]因而“欲救中国,非立宪不可;欲立宪政,非君主不可”。^[5]要求“废民主而立君主,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6]

杨度认为民主立宪党人“不过借立宪制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总统更迭会引发竞争,而君主更迭不会。他以为“二次革命”便是铁证。“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7]继位君主仅依凭血统,非其他资历所能代替,因此“比较不生,自然归一”,总之,“继任大总统敌多助少,继位之君主敌少助多”。^[8]因此,“继任之大总统,仍须以专制弭一时之乱;继位之君主,则能以立宪弭永久之乱”。

但杨度的论证中有几处不合理:首先,血统继承依然会导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若不如此,为何漫长的中世纪都没有杨度所谓的继位君主以立宪弭乱?第二,杨度指责“二次革命”为争夺大总统之职,因此总统竞争会造成战乱。但问题是,“二

[1]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大中华》月刊(1915年8月30日)。

[2] 杨度:《筹安会第二次宣言》(1915年9月29日),第593页。

[3]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07页。

[4] 杨度:《君宪救国论》,第577页。

[5] 杨度:《谈筹安会》(1915年8月),第590页。

[6] 同[2],第594页。

[7] 同[4],第574页。

[8] 同[7]。

次革命”仍属革命范畴，而非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常政治竞争，民主立宪党人的革命目标亦非不断革命；林肯当选总统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但该战争不失为美国的“二次立宪”，于国有益无害。第三，杨度对君主立宪的论证陷入了首尾矛盾，即因为君主无所竞争故能和平立宪，又因为有宪政所以君主被限制（从而不再是无所竞争）。但此二点无法同时满足，杨度意义的君主立宪实现条件太过苛刻。要知道，中国人很难理解华盛顿在可以继续连任的情况下急流勇退；以笔者管窥蠡测，数千年中国政治，位居君位而能自限于宪政者，唯蒋公经国。^[1]杨度却依然执着，“山川紫气今何处，我欲一往寻真人”。^[2]无疑，杨度已经洞察中国政治迥异于西方政治的要核——英才政治。唯其如此，我们才更不应当向往偶然出现的蒋经国，因为一个拥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

（4）反对政党内阁。

民国成立后政党林立。通观全国新政党之数不下一百余种，然而彼等并非为革命开发民智，增进政治思想，而系完全依仗权势、利害及地理关系……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开始瓦解，举国将成为党政之巷……中国政党结社之勃兴适足以阻碍其国政之发展，而启官民交争之端，其结果徒成为扰乱天下之工具而已。^[3]

杨度亦因此在日后拒绝加入国民党。
为论证本人的新君宪思想，杨度又重新评估了三种君主国家。

表 3：三种君主国家

国家	人民程度	国会与宪法的先后关系	国会与君主的权力关系
英国	至高	国会立宪	国会权力几于万能（虚君）
德意志	中平	君主与国会共同立宪	民权远不及英国
日本	低	据钦定宪法开国会	民权更不及德意志

[1] 中国中世纪王朝当然存在君主开明专制，但这只存在于君主的某段政治生涯中；一旦君主掌握绝对控制力，便从开明专制退到放任专制。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参见朱永嘉：《论曹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

[2]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五月二十八日），第 937 页。

[3] [日] 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 247 页。

此时的杨度认为英国是虚君共和（在论证上，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名为虚君共和，以表明人民程度高与共和制的匹配关系），“以中国程度而论，决不能取法英国”。^[1]“我国改为君主以后，其宪法宜取法普、日之间。”^[2]

（日本）立宪之成，半由于人民之要求，半由于皇室之远识，故能以钦定宪法行之，此非他国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国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开过于当时之日本，而君主之资格又不及其久远，若用钦定之法，未必能饜食人民之心，故宜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议决，成立宪法之手续，以此为最适宜。至于宪法之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日本。^[3]

至此，杨度已经由师法英国转向师法德日，并要在共和之后重启帝制，从而在逻辑上完成了他的立国之道——拨乱、求治。而符合这一标准的盖世英才惟清季重臣、民国总统袁世凯莫属。君主立宪有两大武器：舆论和兵力。^[4]杨度为手握北洋的袁世凯组建“筹安会”，或许在他本人看来，正是这两大武器合璧之举。但政治的转变并不以政治儒生的意志为转移，虽然杨度希望的洪宪帝制发生了，但接下来的历史演变，却未必全如他意。

3. 能以逍遥通世法

半个世纪前，乃师王闿运劝谏权臣曾国藩称帝遭拒；半个世纪后，杨度劝谏总统袁世凯得准。王闿运“通经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旃期无一日而或息者”，^[5]就这一点而言，杨度可谓得其真传。

但就洪宪帝制一事，乃师王闿运却与杨度背道而驰。王闿运的藏头对联对袁世凯不留情面——“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而杨度笔下的袁世凯颇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感：“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1] 杨度：《君宪救国论》，第579页。

[2] 同[1]。

[3] 同[1]。

[4] 详细内容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54—355页。

[5]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5页。

然而连袁世凯之子袁克文都参与到反帝制的浪潮中：“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时下世人对此事的评判足见一二。

“虽然未复赤帝基，草庐遇合令人羨”，^[1]多年前杨度在日记中表露了对诸葛孔明“待访”成功的欣羨——即使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多年之后，杨度南柯一梦，帝基未复，个人遭际亦不足以“长使英雄泪满襟”，故有挽袁世凯（亦挽君宪梦想）之联：“共和决误民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以还，再平此讞。君宪不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2]

关于中华民国中断于洪宪帝制，民主立宪梦想就此夭折，今人多以为出于立宪派混入其中，开历史倒车，虽然作者尚未指名道姓，但想必杨度自然是其中之一。^[3]问题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怎会在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时将权力拱手让与立宪派人士？杨度等人的出场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革命党人未解政治难题的重现。袁世凯虽然表彰杨度，赏赐亲笔匾额“旷代逸才”，却并不委以重任，只以杨度“帮闲”，借梁士诒“联合请愿团”架空筹安会的作用，可见当权政客与“欲筹天下安定之策”的政治儒生迥异的现实政治观感，亦可见政治儒生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政客是“风”，政治儒生只是“草”。杨度本人当然明白，“儒者入世，处处荆棘，由其志在功名，细人得而侮之”。^[4]在庚子年间，他还多次劝解友人要“绝口不言京内之事，以政本多门，至为纷乱，言之足以召祸”；^[5]深知“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6]的杨度也曾遥念屈原，感叹“沧浪之水何时清”。^[7]难道今日的士人仍然陷入杨度自设的逻辑陷阱中，看不出政治的运转逻辑，将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归于杨度？“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帝制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7年，清廷原定正式立宪的那年（1908年《九年预备立宪》），张勋复辟。旧有“保皇”势力，自然都被张勋看在眼里。面对张勋，壮志未酬的杨度心有戚戚，“愿奋起救饥拔溺之怀，挽此将亡未亡之局。时不可失，

[1]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五月二十八日），第937页。

[2] 杨度：《挽袁世凯联》（1916年6月上旬），第611页。本文所引挽联系杨云慧藏抄件，与《三水梁燕孙年谱》所载略有不同，后者流传甚广：“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但笔者以为杨云慧抄件似更符合杨度心迹。

[3]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4]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四月四日），王闿运语，第927页。

[5] 杨度：《杨度日记·庚子日记》（九月二十三日），第1074页。

[6] 杨度：《寄梁启超函》（1903年10月4日），第96页。

[7]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五月二十二日），第936页。

机不再来”，^[1]更称张勋为“肝胆仁义之士”，^[2]救国的英雄大侠。但4个月后，杨度即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

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3]

显然，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改正朔、易服色的政治大事件，杨度有所警觉。他一面是批驳张勋，更多的一面则是为自己的君宪主张辩护。以此观之，张勋复辟与洪宪帝制并不等质。但“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拳匪牺牲（引者按：指张勋复辟），永无再见之日”。^[4]

此后，杨度心灰意冷，“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5]“眼底山川能适意，乱离身世听悠悠”，^[6]“穷通治乱无关系，任我逍遥自在天……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7]但他始终未能领略乃师“能以逍遥通世法”的解经问世之道，对他来说，暂入佛老只是“我欲出家身犯罪，敢以佛事为遁逃”。^[8]我们亦不可据杨度曾讽刺的“偷生主义”^[9]反讽他，对于杨度而言，这种放下，也是权且放下，静观其变。这一点，乃师王闿运十余年前已洞察：“有近名之心，又非隐居求志之所宜也。”^[10]

四、尾声：余孽

在短短5年时间，嫁接中国的两种西方典型政制，皆水土不服而最终夭折。杨度

[1] 杨度：《复张勋函》（1917年3月13日），第614-615页。

[2] 同[1]，第614页。

[3] 杨度：《反对张勋复辟公电》（1917年7月3日），第616页。该电文稍作改动后又于同一天发致《时报》及孙中山等人，可见杨度十分重视就该问题表明态度。

[4] 杨度：《致〈时报〉及孙中山等电》（1917年7月3日），第617页。

[5] 杨度：《反对张勋复辟公电》，第617页。

[6] 杨度：《题齐山人〈借山图〉》（1917年7月），第619页。

[7] 杨度：《遁亡杂诗》（1917年），第622页。

[8] 杨度：《送方叔章归湖南并寄华生午亭》（1917年），第621页。

[9] “将一切世事，本吾身应负之责任者概行放下，惟一己之私利是图，流入于个人主义，变言之即偷生主义也。”载杨度：《金铁主义说》，第270页。

[10] 杨度：《杨度日记·戊戌日记》（十一月三十日），第960页。

作为这个时代参与政治的士人，带着帝制余孽的声名（度人），退回到佛老之中（自度）。

1. 自度？度人？

杨度自更名为“度”，尚不可考何年何故。我们只知，治学公羊的杨度不会随意拣选词汇命名。10年前（1907年），杨度曾悼念亡友胡茂如，其中所言，或可作为“度”字注解，若作为“帝制余孽”的他重读旧作，亦不无反讽：

鸟兽既不可与同群，而人类社会利害相冲，即恃道德维持，而道德或转为利己倾人之具，使非有圣德者为人谋利，而不与人竞利，则人群亦将难入。故古之圣人，必以一身立于利害竞争之外，而后入世之道不苦。先能以此自处，而后更以观人，则人之待我，无在非诚，满街都是圣人，无可施其尤怨。即或争名争利，亦皆不得已而求存。如得其情，应哀矜而弗喜，不仅弗喜，且当代谋。以此度人，即以自度。故古来圣哲，于己无往而不乐，于人无往而不悲。惟不欺己，乃不欺人。释、耶、孔、墨皆言救人，而同时必言克己。^[1]

10年后的杨度则说：“世事由来认人作，人生得失谁能度。”^[2]两次谈“度”，恰隔10年，上次谈“度”的那份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已经不再；此次谈“度”，一面说人生得失无常，难以确定；一面又暗指岂是区区杨度本人所能预判之意。

虽然杨度此次退入佛老，将10年前所谓的“克己”发挥成“无我主义”，但杨度不会真正的“无我”，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一点上是最纯粹的政治儒生，一定会从“自度”重新进入“度人”。“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3]这也就不难理解此后杨度的政治行为——1922年参与游说曹锟等直系军阀，打消他们援助陈炯明攻打孙中山的计划；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杨六译？

乃师王闿运曾与肃顺结交，有兄弟之谊，本想一展抱负，却无奈“祺祥政变”。

[1] 杨度：《哭亡友胡茂如诗并引》（1907年10月15日），第418页。

[2] 杨度：《东洲行·送程戟传还衡阳》（1917年5月上中旬），第615-616页。

[3] 杨度：《新佛教论答梅光羲》，第765-764页。

王闳运后人曾国藩幕府，劝曾国藩称帝；被曾国藩婉拒后离开。就此而论，杨度的境遇与乃师极似。他本人不无感慨：“三次想实行君宪，时机都不错，主张都不错，以主持者之不行，都遭到失败，亦所谓天不从人愿耳。”^[1]“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2]颇有“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之感。

实际上，杨度共有4次主张君宪。第1次，清廷尚在，主张人民促成君宪（师法英国君宪）；第2次，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后，杨度则主张君主促成君宪（师法德日君宪）；第3次，民国建立后，杨度以人民程度不足之故主张君宪（洪宪帝制）；第4次，洪宪失败后，杨度以张勋英才主张君宪（张勋复辟）。以4次主张君宪为主线，杨度一生共有6次思想转变：由人民促成君宪（1907）转变为君主促成君宪（1908—1912），又转变为赞同中华民国（1912—1913），继而转变为以人民程度不足之故主张君宪（1913—1916），又转而支持张勋复辟（1917），旋即反对张勋复辟退隐佛老（1917—1922），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师法俄国，1929—1931）。同门廖平即一生六译（故有《六译馆丛书》），以此称杨度六译亦十分恰当。

伍豪（周恩来）为杨度正名为共产党人后，国人往往为这位“帝制余孽”正名为“爱国主义者”，但与其流俗地称杨度是爱国者，不如说杨度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儒生（“爱国心者，与责任心异名而同物者也”^[3]）。“吾人生此国，当此时，则取眼前之责任而负之，上当政府之冲，下谋人民之福，力为其难者而已矣。”^[4]

3. 筹安会今安在？

杨度曾豪言：“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5]但后来却走上了“为人之学”的道路，成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政治儒生。他的身体历程也是中世纪政治历程的缩影——师法英国、德国、日本，最后落脚到俄国。

“虽有国土之力，不能自举其身”的政治儒生情怀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遁世情怀交织纠结，夺去了屈原身心，直至张东荪事发，已夺走中国士大夫的魂魄。中国士人中，不缺乏文吏，亦不缺乏遁世山人，而缺乏“虽无文王而由兴”的“独立

[1] 杨度：《与王舒的谈话》（1917年），第620页。

[2] 杨度：《逃亡杂诗》（1917年），第622页。

[3] 杨度：《金铁主义说》，第340页。

[4] 同[3]，第346—347页。

[5] 杨度：《寄梁启超函》（1903年10月4日），第96—97页。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豪杰之士。

1916年4月，杨度辞去参议院参政后，致《亚细亚报》等报馆，虽有自贬之意，却不失为对士人问政的一翻警醒：“妄以救国之愚忠，不自量其微薄，聚徒开会，发愤著书，思以文字觉悟吾民，求君宪之安，避共和之大乱。”^{〔1〕}梁启超之所以没有遭遇杨度的问题，端赖于他深知：“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困扰杨度的不只是政治契机，还有生死——“死生从古困英雄”。^{〔2〕}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夜（1931年9月17日），杨度去世。他生前写下的自挽联，不失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3〕}

杨度已逝，筹安会仍在，梁启超言犹在耳。

〔1〕 杨度：《致〈亚细亚报〉等报馆公电》（1916年4月20日），第609页。

〔2〕 杨度：《挽黄兴联》（1916年11月初），第612页。

〔3〕 杨度：《自挽联》（1931年9月），第698页。